

背后运转着的形形色色深层动机,包括骄傲者和斥骂“骄傲”者的多色调的个人心理和群体行为。

二

攻讦他人“骄傲”的言论在书中被怀疑地审视,然而人物对自身的反省却得到叙述的支持和认可。男女主人公冰释前嫌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就是认识并修正一己骄傲心理的自我改造历程。对于伊丽莎白来说,转折点是阅读达西辩白解释、披露魏肯过往行为的长信带来的惊愕。心情几经反复,最后她不得不承认“事情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并开始感到“羞愧”:

我还一向骄傲,自认为能明辨是非善恶呢!——我还一向自视甚高,自认为本领高强呢……我犯傻不是因为堕入情网,而是蠢在虚荣。相识之初,某人对我表示欣赏,我就高兴,另一个人不搭理我,我就气恼……我追随成见和无知,却驱逐了理智。到此刻为止,我竟毫无自知之明。(II. 13)

姑娘如此检讨自己心中那份与虚荣和偏见纠结在一起的骄傲,可谓触及灵魂——此刻她不仅放弃了笑看他人的居高临下立场,而且尝试用别人的眼光打量自己,意识到自己如何被受伤的自尊心遮蔽了判断力。随后,她更加羞惭地看出自己曾是魏肯“无聊卖弄随意献殷勤的对象”(II. 18),意识到他如何轻易地操弄了自己的虚荣心。

无独有偶,达西的二次求婚也表现为深度自我批评:

我虽然不赞成自私,实际上却一直是个自私的人。小时候家里教导我什么是对的,却没教我改掉坏脾气。他们教我正确的准则,却任由我高傲自大地去实行那些准则。我不幸是唯一的儿子……父母把我惯坏了……容许、鼓励甚至教唆我自私自利,专横傲慢,只关心自家人,其他人概不放在心上,看不起世人,至少是想把他们的

见识和价值看得低我一等。(III. 16)

达西从伊丽莎白当初针对自己的激愤抨击起步,甚至“追查”到他的家庭、阶层乃至性别的教育方式和思想境界。他诚恳表示是对方给他“上了一课”,使他“被挫去傲气”。值得指出,在柯牧师那里沦为虚伪口头禅的“谦卑(humble)”一词(或同词根的动词、分词和名词),在主人公们的自责中反复出现,表达着他们重新认识人我关系的努力。作者似在提示:倾听刺耳之言并经历痛楚的自我否定,是通向幸福的必经路;有别于班家小“作”女莉迪亚的任性私奔,真正的浪漫之爱同时又是辛苦的教育与被教育。

欣赏小说精彩反讽开篇的读者常常未能注意语调平实并收笔于“感谢”的结尾。各种程度和色彩的“感谢”乃是维系生活共同体的根本纽带之一。小说不仅借魅力四射的反讽尖锐地讥刺世道,还适当地解构了嘲讽者的高高在上视角,甚至进而尝试构想金钱世界中人际关系的重修。题材局限于三四户乡村人家的奥斯丁婚恋故事,眼界和关怀其实不小。

① Barbara Everette: “Jane Austen: Hard Romance” (U. of London, 1996), p. 3.

② 参看 Robert B. Heilman: “E pluribus unum”, in John Halperin (ed.): *Jane Austen: Bicentenary Essays* (Cambridge UP, Cambridge: 1975), p. 125.

③ 英语词 pride 多义,不完全是贬词,其义项中包括“自大”、也包括“自尊”,因此在小说正文或其他语境中不能都译为“傲慢”。

④ 括号内标注的是该小说引文出处,罗马字码表示卷数,阿拉伯数字为章数。依据的版本是由 Janet Todd 主编的剑桥版 (Cambridge UP, 2006, ed. Pat Rogers)。译文参照了多种译本。

⑤ 语出 Marilyn Butler: *Jane Austen and War of Ideas* (Clarendon, Oxford: 1975), p. 206.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文学公共性的跨国旅行?

赵 勇

几年前,当我梳理文学活动与文学公共性的

关系时,我的结论是悲观的。我觉得文学公共性

一旦消失,所谓的重建将面临很大的难度。因此,公共性的追寻不可能在文学之内,而应该在文学之外^①。时至今日,我的这一观点并无太大变化,但不时出现的文学景观却让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对于文学公共性,以前我们只是在中国本土寻寻觅觅,但实际上它早已开始了自己的“旅行”,直至在西方世界开花结果。这么说,莫非异国他乡已成了中国文学公共性的再生产基地?

让我们从莫言谈起。莫言的《丰乳肥臀》是一个具有文学公共性的作品,这不仅是因为它当年遭到“左派”声讨和批判而成了一个公共事件,而且还因为它在公共性(即我所谓的介入性、干预性、批判性和政治诉求)与文学性之间保持着某种张力和平衡。其后,无论是《檀香刑》还是《生死疲劳》和《蛙》,作者写作的基本策略都是在强化文学性,弱化公共性。于是,莫言所谓的“结构就是政治”演化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其写作技术成为专家学者内部隆重讨论的事情,成为“吃莫言这碗饭”的学院批评家欣赏、赞叹、分析、呵护的对象。与此同时,这些作品却几乎没有在文学公共领域造成任何动静。

然而,莫言的作品在国外却有了不同的待遇,它们被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荷兰、瑞典、挪威、波兰等多种语言,并在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获得多种文学奖项,直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种情况表明,如果说莫言的小说后来具有了某种文学公共性,那么它主要是在国外的西方世界被建构起来的。而当他获得“诺奖”成为一个巨大的公共事件后,这种公共性(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那篇授奖词)才杀了个回马枪,从而对中国的评论界和舆论界构成某种“压迫”,使它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被承认”的话语,甚至使它们面对这种“被承认”而感到汗颜和难堪(授奖词刚颁布时,我就亲耳听到国内的资深评论家感叹这篇授奖词写得如何好,国内评论界没想到这一层,应该深以为耻)。在这种复杂的“承认的政治”的游戏中,莫言的作品仿佛具有了一种文学公共性。

余华的情况也很能说明问题。现在看来,《兄弟》当年在国内的面世无疑酿成了一起公共事件。这部长篇虽如作者所言,是对“文革”和“现实”的“正面强攻”(这意味着作者想让它具有一种公

共性和批判性),但在上、下卷分别出版的日子里,它也处在了媒体批评、读者批评和学院批评的交叉火力之下,收获了一片骂声。评论家一方面在发问“《兄弟》为什么这么差?”(李云雷),一方面又在为这“差”寻找着原因:“专业常识和市场动态却告诉我们,《兄弟》是一部很差的小说。余华仿佛草草地将《故事会》装订成册投放市场,赢得了更多的消费者。余华明明已经迷失在一个通往阅读市场的‘宽门’里,却假装走在一个神秘而又庄严的‘窄门’里。”(张柠)“余华在写《兄弟》时不在人物的里面,他站在外面,他已经感受不到《在细雨中呼喊》那样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他的目标说到底也就是讲一个有趣的、热闹的、看上去‘深刻’的故事。”(李敬泽)《兄弟》之所以是“顺势之作”,不仅在于它“写了很多性,很多暴力,写得很煽情很刺激,而更在于《兄弟》扣准了大众心中隐藏的密码,顺应了大众内心的情感趋向和阅读习惯”(邵燕君)。在此期间,虽也有“复旦声音”力挺余华^②,但在国人心目中,《兄弟》仍是“失败”之作。

然而,两年之后,被译成法语的《兄弟》在法语界却完全是另一番风景——不仅获得“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Prix Courrier International),而且得到一些重要媒体的书评推荐。它被誉为“大河小说”、“休克小说”和“具有流浪文学色彩和滑稽文风的小说”(瑞士《时报》),“一部叙述中国的庞大的流浪汉小说”(《自由比利时日报》)。并被如此定位和盛赞:“《兄弟》这部小说恢宏庞大、雄心勃勃,这部杰作在其讲述中包含了一代人的全部希望:战胜饥饿,根除暴力,完成经济转型以及命运转换”(《卢森堡日报》);“《兄弟》的作者具有非常突出的才能,他用惊讶但不失关怀的眼光看待世界”(法国《解放报》);“《兄弟》不失灿烂,波澜壮阔,发人深省。透过这两种命运,看中国社会的动荡。余华向我们讲述中国的偏激、矛盾和踌躇”(比利时《晚报》);“从未有过这么一个家庭故事如此构思得当,如此谰妄狂热、完全不敬的,可以把人逗笑到又笑又哭,也从没有人向我们传达过这样的一个中国”(特利尔《义务报》)^③。由此看来,无论是公共性层面还是文学性层面,《兄弟》都是对法语读者的一次征服。这是文学公共性在西方世界的又一次凯旋。

《第七天》2013年面世后所遭到的批评与《兄弟》当年的遭遇如出一辙,但据报道,《第七天》法文版不久就会推出。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新一轮的盛赞之辞将会在法语世界重现?文学公共性的激情戏也将会在法兰西隆重上演?

我之所以特别指出这一现象,是觉得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文学公共性也已像“理论”那样开始了它的“旅行”。而吊诡的是,那些在国内公共性欠缺或伪公共性突出的文学作品,却往往会在异国他乡“旅行”出一种公共性。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让我们聚焦《第七天》,略作分析。

《第七天》主要是在讲述杨飞与其养父的“父子情”(或许还要加上刘梅与伍超的恋爱故事),为了使故事具有某种公共性或现实批判性,作者把主人公打发到阴曹地府,与许多买不起墓地的亡灵或冤魂相遇,于是大量的新闻事件似乎也就有了进入小说的理由。这些被读者讥之为“新闻串烧”的东西固然呈现了当下中国的乱象,但它们在中國的语境中却只是制造了文学公共性的假象,而并不具有真正的公共性价值。何以如此?因为中国读者每天就生活在这些故事里,他们对那些已是旧闻的新闻事件已耳熟能详;另一方面,每一起重大的负面新闻一经出现,即意味着它被新闻媒体大面积报道,被无数网民大幅度围观,被无数跟帖大尺度评论,这一过程本身已释放了巨大的公共性能量。因此,当那些新闻事件在小说叙事中轻巧地穿插跑位,或者说以“电视剧中植入广告”的方式呈现于世,它们就既不能给读者带来震惊体验,也无法让小说产生应有的公共性效果。在公共性的呈现上,小说或许永远都无法与新闻同日而语。但是,小说却可以从新闻思考的终结处再度出发,进而把熟悉的事件陌生化,把已成旧闻的新闻事件美学化。唯其如此,小说才能够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文学公共性也才有了诞生之本。如果小说只是挪用、拼贴和戏仿新闻,甚至被新闻思维所左右,那么它既无法超越新闻的公共性批判,也无法完成自己的文学批判。充其量,它只是生产出一种可供参观的展示价值。

这种展示价值对于中国的读者当然不可能有多大意义,但是对于西方读者却会形成不一样的效果。正如我们不会去特别关注发生在西方社会

的新闻事件(重大新闻事件除外),西方公众恐怕也没有多大精力天天去关注中国的动静。但随着中国的崛起,他们又有了了解中国的浓厚兴趣。已有研究者指出,《兄弟》之所以能成为近年来法语界最受关注的中国文学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题材”:“从法国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特征来看,译介者除了关注作品的文学特性之外,还特别关注作品内容是否具有社会性、批判性,乃至政治性,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要素还有可能取代文学性,成为译介者的第一选择标准。译介者的选择心态实际上也反映出整个法国社会的阅读取向,在阅读一部中国文学作品时,读者并非仅仅抱有一种文学审美的心态,还常常伴随着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了解欲望。”^④既然这就是《兄弟》在法语界成功的理由,那么我们同样可以预测《第七天》在法语界的胜利。因为从“了解”的角度看,它提供了比《兄弟》更密集的新闻线索、新闻元素、新闻素材或新闻内容,能让西方人在短时间恶补上不熟悉当下中国这一课,并让他们在现实性、批判性和政治性的维度上去确认这部作品的“勇敢”和“伟大”。果如此,这不是意味着文学公共性在法语界的又一次爆发吗?

如此看来,文学公共性在今天已成为一个跨越国族边界的世界问题,值得进一步反思。而我之所以做出如上分析,并不是要说明那些被再生产的文学公共性全无意义,因为它毕竟满足了文学的认识价值,也给西方公众提供一条观看中国的文学渠道。然而,我也必须同时指出:一、与国内的文学公共领域建设相比,国外的文学公共性生产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次要的事情。如果我们的文学只是在本土培养着“文化消费的公众”,却反而造就了一批从事“文化批判”的世界公民,那么,这既显得奢侈,也意味着文学责任伦理的严重缺席。二、那些有着国际视野或世界眼光的大牌作家,他们很可能已把自己的目标受众或“理想读者”定位于西方世界。他们之所以没有放弃也不可能放弃国内读者,是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与中国这个巨大的文学市场相提并论。于是,在国内酿成公共事件而在国外赢得公共性尊重,或许已经和正在成为一些作家的写作策略。说得再清楚点,中国只是他们获取“货币资本”的大本营,西方才是他们积累“文化(意

义)资本”的主战场。三、长期以来,中国都是被西方“他者化”的客体。通过对“东方奇观”的“凝视”,西方人也从中获得了一种痛感或快感。而在文学公共性的跨国“旅行”中,中国也重新被置于“被看”的境地。那么,新一轮的“看”与“被看”会跳出原来的视域进而会增加别的什么维度吗?倘若不能,我们的文学是否仅仅为这种“凝视”提供了新的理由和证据,从而偏离了文学本应该达到的真正目的?

我再用一句话表达一下我的意思:我并不反对文学公共性的跨国“旅行”,我质疑的是它目前这种“无中生有”的样子。

①参见赵勇:《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中国当代文学公共领域的反思》,《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

②参见潘盛:《“李光头是一个民间英雄”——余华〈兄弟〉座谈会纪要》,《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③参见《〈兄弟〉在法语世界——法语书评翻译小辑》,王侃等译,《文艺争鸣》2009年第2期。

④杭零、许钧:《〈兄弟〉的不同诠释与接受——余华在法兰西文化语境中的译介》,《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公共性”与中国文学经验

李建军

最近,在一篇题为《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文章中,美国汉学家葛浩文阐述了他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质疑和评价,以及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看法。他顺着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所提供的线索,寻绎出了中国文学缺乏世界性和人类性的根本原因:“现代中国作家的‘感时忧国’倾向使得他们无法把自己国家的状况和中国以外的现代世界的人的状态连接起来。夏老的评论重点在于现代作家如鲁迅、茅盾等人,但我个人认为当代作家也有不少有类似情况,太过于关注中国的一切……”^①这样的认知和判断,彰明昭著地显示着论者对中国文学的隔膜和误解。他不知道,“感时忧国”既是中国文化精神中固有的伦理情怀,也是中国文学精神里特有的“公共性”品质。

与葛浩文对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误解一样,在谈论文学的“公共性”问题的时候,缺乏“东学西学,道术未裂”理念的人,总是倾向于怀疑和否定中国文学的伦理精神。他们将“公共性”当作一个纯粹的现代性话题,当作一个纯粹西方的文化理念,进而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学经验中,压根儿没有什么“公共性”可言。事实上,文学上的公共性,既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不同

的时期,它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又是一个差异性的概念——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情感内涵和个性风貌。就其本质而言,所谓“文学公共性”,无非是指一种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和批判精神,要求写作者积极介入公共生活,以反思、反讽甚至反抗的方式,表现自己对时代生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判断、不满和希望。文学的“公共性”所关涉的核心问题,从功能角色和社会作用的角度看,是要求作家致力于促进读者的人格发展和生活的文明进步,将自己当作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服务者”,因为,就像埃斯库勒斯所说的那样,“自古以来,有名的诗人都为人群服务”^②;从生命伦理和情感态度来看,写作者要懂得爱和怜悯的价值,要同情无助的弱者和陷入不幸境地的人,要关注生与死、苦难与拯救的大问题;从与权力的关系看,作家要正道直行,服从“不虚美,不隐恶”的写作伦理规约,敢对权力说真话。

雨果说:“愤怒与温情,是对于人类不自由状况两个方面的不同反应,并且,能够发怒的人就能够爱。”^③中国古典文学的“公共性”,就具有这种既“愤怒”又“温情”的特点:一方面,是“愤怒”和不满,具体表现为对权力的“以究王诤”的“上层反讽”^④;一方面,是仁爱和“温